

关于当前农村人口结构的经济分析

敬义嘉

【提要】 本文从人口结构的不同功能子结构的角度分析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和机遇，通过对农村人口矛盾的定性分析和量化评估，在更广泛和更明确的意义上反映农村人口矛盾的实质和关键环节，以探讨适合当前农村实际的人口经济的政策选择和目标模式。

【作者】 敬义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生。

人口问题在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在经济总量模型和两部门模型中，资源、资本积累、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要素地位是逐渐确立的，而人口因素，尽管随时代发展内涵发生变化，却表现为恒定的内生变量，并为其它要素提供能动性刺激和最终的价值归宿。在对人口、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中，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开辟了新的视角，通过广泛运用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和计量分析，建立人口效果和经济效果量化模型，为现实人口决策提供可参考的数据和理论，使人口研究、管理和人口政策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中国人口问题的重点在农村。目前乃至将来，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是人多地少。但这并没有直接提供解决问题的相应突破口。人口过程是一个社会经济过程，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当前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原有人口结构的冲突又加剧了解决的难度。新一轮改革开放实践正努力营造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体制环境、人文背景和其它社会经济条件。本文试从人口结构层面对农村人口状况作出评估，并对农村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个体决策提出建议。

1. 低水平的农村人口产业结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起飞

人口产业结构指经济活动人口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人口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变的过程。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结构的扭曲性，表现为产值结构转变的超前性和人口产业结构转变的滞后性，已经成为经济协调发展的严重瓶颈，农村的情况尤为显著（见表 1）。

表 1 农村人口产业结构与产值结构比较 %						
年 份	农村人口产业结构 (PLi)			农村产值结构 (PVi)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0	79.4	11.3	9.3	46.1	47.5	6.4
1993	75.2	12.5	12.3	27.5	63.6	8.9
1994	73.2	13.2	13.6	25.7	64.8	9.5

注：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
资料来源：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95》整理。

研究表明，目前农村人口产业结构仅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水平，产值结构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水平。这主要揭示了两个问题。首先，农村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尚处于由传统型向发展型过渡的阶段，大部分农村经济

活动人口仍处于与土地的直接结合状态，存在大量潜在和显在的剩余劳动力。产业间的人口转移还处于初期阶段，更大规模的转移在酝酿中。其次，农村人口产业结构水平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水平，在产值结构已基本改观情况下仅有微量调整。人口产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偏离度

公式^[1]为：
$$G = \sum_{i=1}^3 |PL_i - PV_i|$$

其中 G 表示结构偏离度，PL_i 和 PV_i 为第 i 产业的人口比例和产值比例。表 1 各年份中 G 值分别为 0.724、1.022 和 1.032，存在扩大趋势。基于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布的不同，结构偏离度在剔除产业劳动生产率自然差异后为非正常偏离度，反映劳动生产率分布的悬殊程度。劳动生产率自然差异的标准采取世界一般水平，当世界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为 A₁ : A₂ : A₃ 时^①，非正常结构偏离度为：
$$G' = \sum_{i=1}^3 \left\{ |PL_i - PV_i| / 1 + \frac{A_i}{\sum A_i} \right\}.$$

1990 年中国农村的该数据测得为 0.586，全国为 0.542，美国为 0.081。农村非正常结构偏离度畸高，表明劳动生产率在各产业间分布极不均衡（按人均 GNP 计算，1994 年农村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比例为 1 : 12 : 2）。技术对比的悬殊限制了技术由高级产业向初级产业流动，妨碍了整个产业技术的进步。结构的高偏离度又巩固了这种状态，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剩使采纳技术的比较成本提高，形成人口对于生产力的压迫，导致技术停滞和劳动生产率僵化。这直接导致产业部门力量对比的不均衡，分散的农业生产者群体更易受到其它产业垄断力量的支配，导致农业贸易条件恶化，破坏整个产业链条，加剧资源配置的不协调。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产业结构中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与依靠国家积累实现的城市工业化不同，农村工业化主要是一个自然的经济过程，受到产业部门均衡发展的制约。从产值构成看，1987 年农村非农产值已超过农业产值，农村已步入轻工业主导阶段，轻工业增长的推动来自消费为主的诱导机制：农业部门发展滞后，市场狭小，直接限制了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减缓了劳动力与土地分离的速度。目前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商业化水平低，小城镇规模效益不明显，大量闲置的适龄人口文化素质偏低，缺乏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农业的被剥夺使农民收入偏低；粮食收购、流通和储备体制落后使大量户存粮不能变现。这些都压制了农村市场的规模和层次，使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在生存水平上徘徊。促进人口产业结构向高层次转变，带动产业一体化和获取结构效益，落脚点必须是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拓展经营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增加投入和调整价格，进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创新，为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同时稳定发展第二产业，加强原有手工业的升级换代，发展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和深加工等增值留利环节，重点发展具有后向联系效应的中间投入型制造业，拉长产业链条，提高劳动吸纳能力。第三产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劳动密集的特点。据测算，每增加一个就业机会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重工业为 10 000 元，轻工业为 6 000 元，而第三产业仅 1 700 元。1980 ~ 1995 年，中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长率为 6.95%，同期第一二产业分别为 0.84%、4.19%，第三产业将成为“九五”期间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多的部门^[2]。

2. 农村劳动力资源重组是解决人口产业结构失衡的关键

1994 年农村人口达 9.15 亿，农业劳动力 3.27 亿。保守的估计，其中有 60% 处于不同程度的就业不足，即部分劳动力移出农业不会带来总产量的变动。农业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是有

① 剔除依据在于劳动生产率与社会平均值的差异越大的部门，结构偏离倾向越大。1990 年世界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比例关系根据美国和印度当年的三次产业劳动力人均 GNP 加权（权数为 0.2、0.8）综合取得，为 85:13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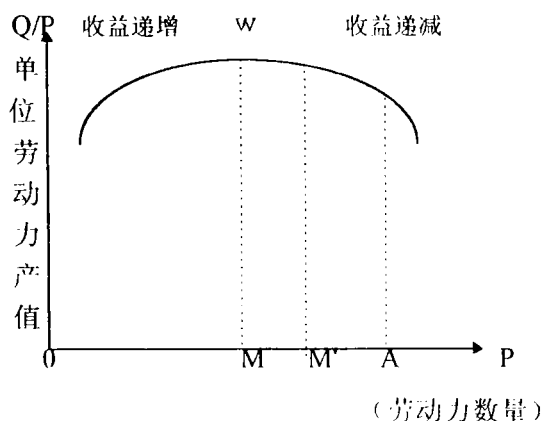


图1 劳动力人口理论最优点曲线

限的^③ (见图1)。

W为最优平均收入点, M为该水平下的劳动力数量, M'为适宜的劳动力数量(农业产量最大化所需劳动力数量)。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实际处于A点, 如果减少(A-M')的人口, 不仅总产量不变, 而且边际收益会提高, 这部分人口约有1.5~2亿。劳动力过剩是威胁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劳动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分化组合

正自发进行, 这是符合理性的自然选择过程, 突出表现在部分农民脱离土地和流向城镇。

农民脱离土地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非农人口占农村劳动力比重1992年为30%, 1993年为36%, 1994年为39%。目前农村家庭户均耕地8.6亩, 如全部种粮, 以1994年平均亩产(271公斤)和粮价(假设全部以1994年市场均价1.4元/公斤出售)计算, 其收入3262.8元, 不足应付1994年农户人均1016.8元的消费支出。种植业是低附加值产业, 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取得平均的社会报酬, 客观市场评价要求部分劳动力从有限的利润环节中分流, 实现与可再生资源的结合。就实际情况看, 中国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1995年8~10月国内市场均价与国际购价(DDP)相比, 小麦高16.75%, 玉米高38.15%, 大米高38.5%, 国内价格体系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保护着农业^④。这就自然涉及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系问题。就我看来, 二者的积极效应是互补的。适度规模经营体现在经营土地、主业的规模和产前、产中、产后的配套服务的社会集中上, 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表现为劳动的组织形式和经济成果的核算单位上。二者结合, 就可以在技术的诱导、供给机制和利益激励机制上实现以土地产出率提高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使利润最大化取代产出最大化, 成为农民的经营目标。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接近工业, 农业的比较效益才会从根本上提高, 农业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经营才能替代传统农业。只有这样, 商业化农民才有能力形成市场中的利益集团, 按照市场的机制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变产业间的单纯买卖关系为以利益为联结纽带、以契约为联结方式的利益共同体, 增强谈判能力, 减少流通环节和节约交易费用, 维护农业的贸易条件, 防止农业利益流失, 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工贸合作的城乡一体化格局, 最终与市场融合。而土地集中的方式, 目前存在两田制、转包制、租赁制、统营制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设想和主张, 正在小范围推广试验中, 还未成熟定型。由于土地是农村人口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福利保障, 土地的流转和集中应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 采取费边(Quintus Fabius)主义政策^①, 随经济市场化程度推进, 政府应起鼓励协调作用, 通过宏观配套改革, 完善农村保障制度来创造条件。据统计, 1995年中国农村从业人员已超过全部国有企业职工数, 创造总产值54600亿元, 比1994年增长30%, 农村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7.5%, 已成为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费边主义, 即富有妥协性的边际改革, 渐进调整。

生产力布局决定人口的布局^{〔5〕}，非农人口的就业转换通过流向乡镇企业或城镇来实现与生产要素的结合。从部门流向看，主要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经济部门，包括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自我雇佣也占一定比例，国营企业比例偏低。80年代至今的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中，乡镇企业的贡献是主要的（见表2）。

新中成立后，城市赶超型工业化战略造成的城市重工业与农业的产业链脱节，为以轻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但在经过80年代迅速膨胀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阶段后，90年代初有限买方市场的形成，使乡镇企业的粗放经营面临着在资源、规模上具有优势的国有企业和在技术、管理上具有优势的外资企业的竞争。技术高度化、产品上档次的压力使乡镇企业进入艰难的内涵调整阶段，就业弹性降低。1978～1994年，乡镇企业数平均年增长率为19.1%，而年均就业增长率仅9.5%。即使在乡镇企业倍增的1984、1985年，就业增幅也明显滞后，存在小规模化的不良趋势。据表2中1985年以后的数据建立的拟合优度（R²）为0.987的线性回归模型中，职工数（Y）对企业数（X）的回归系数（即就业乘数）仅为4.3，数量扩展已趋饱和。

除农业企业规模保持稳定外，在1984年乡镇企业地位和作用得到肯定后，工业企业在1984年，商业饮食企业在1985年，建筑和交通运输企业在1986年接连发生政策性膨胀，规模明显下降并稳定下来。目前乡镇企业中就业主体仍是工业企业，但是1987年以来，无论在企业数还是职员数上，增长主体都转为商业饮食业。农民廉价劳动力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但其低下的素质已成为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约束。从政策目标看，乡镇企业应尽快摆脱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被动地位，把重点转移到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上，积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

除进入乡镇企业外，外来人员承担了城市大部分的体力劳动和简单手工劳动，属于体制外或体制边缘性就业，由于城市户籍制度、文化素质等原因并没有形成对城市就业的现实冲击。这种城乡分隔的就业体系，是传统城乡分隔体制的延续，使农村人口的最终地位不确定，其利益缺乏制度保护，发展空间狭小。他们一般不愿在城市作长期投资，引致外出口的资金回流效应。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1994年对3520个乡、64152户调查，外出人口（1年有6个月以上在本县外的）年均收入为3977元，邮回和带回的收入占总收入的54%。以此推算，该年全国农村该类流回收入达758.3亿元。这些回聚资金，除部分用于农业积累

表2 1978～1994年乡镇企业发展情况

年份	单位数 (万)	增长率 (%)	职工数 (万)	增长率 (%)	平均规模 (人)
1978	152	—	2826	—	18.6
1979	148	-3	2909	3	19.7
1980	142	-4	2999	3	21
1981	133	-6	2969	-1	22.32
1982	136	2	3112	4.8	22.9
1983	134	-1.5	3234	3.9	24
1984	606	352	5208	61	8.59
1985	1222	102	6979	34	5.71
1986	1515	24	7937	18	5.24
1987	1750	15	8805	11	5.03
1988	1888	7.8	9545	.8	5.05
1989	1868	-1	9366	-2	5.01
1990	1850	-1	9264	-1	5
1991	1907	3	9609	3.7	5.03
1992	2079	9	10581	10	5.08
1993	2452	18	12345	17	5.03
1994	2494	1.7	12017	-3	4.81

资料来源：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5》整理。

表3 分行业乡镇企业规模变化

年份	农业 企业	工业 企业	建筑 企业	交通运 输企业	商业饮 食企业
1978	12.3	21.8	50	16	11.6
1985	11	8.4	95.5	10.7	2.45
1986	10	7.5	14	2	2.2
1994	10.6	10	20	2	1.86

资料来源：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5》整理。

外，主要用于建房、购置家当和置办小产业，成为农村非农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只要善于引导，就能实现“民工潮”向“创业潮”的转变，生长出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善城乡收入差别⁽⁶⁾。从长远看，非农人口在就业转换过程中接受现代经营管理、技术、劳动纪律和价值观念的培训，在社会角色上逐步完成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产业工人的转变，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今后农村每年要转移 1000 万人，具有长期化、全方位、大规模的特点。为此，必须改革城镇劳动就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建立全国统一的多渠道、多层次的开放劳务市场，实现劳动力商品化，改革户籍制度和人口迁移制度，实现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自由流动和组合；在加强宏观指导的同时，深化农村和城镇的福利改革。对农村劳动力外流，堵是堵不住的，合理疏导才具有积极意义。在人口外流负效应上，应当注意外流人口（一般指劳动力人口）中的活跃部分，他们具有较高文化知识和支付能力，富于创造品质。这种人才外流的“回波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明显。

3. 农村人口财富分布结构－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与互动

农村人口财富分布结构可通过收入结构来反映（见表 4）。

表 4 农村人均收入与基尼系数变化

年 份	1978	1980	1985	1988	1994
人均收入(元)	133.6	191.33	397.6	554.9	1 220.98
基尼系数	0.15	0.236	0.26	0.34	0.411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5》及世行发展报告整理。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财富分布发生巨大变化，市场对劳动贡献的评价已消除了平均主义的影响，在收入普遍上升的同时，存在集中化的趋势。先富起来已成为客观存在，收入差距今后还会进一步拉大。

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助于建立经济的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引擎。目前农村高收入人口主要是较早投入市场和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包括企业主、包工头、专业户等。市场介入分配的结果表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素质结构的比较效益，从而在动力系统上起着典型的“沙丁鱼”示范效应，鼓励更多的人融入市场和投资人力。收入格局的变化会引起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消费可能性线上移引起消费偏好的代谢，富裕人口的增加促进了消费支出中耐用品、奢侈品对必需品的替代，拉动消费结构高级化，扩大了商业性消费的比重。这与恩格尔定律是一致的。据抽样调查统计，1992～1994 年农村蔬菜、粮食、肉蛋、棉布和鞋类的人均消费量持稳中略有回缩的状态，而自行车、钟表、电风扇、摩托车、彩电等耐用消费品的人均消费量年增长率超过 10%⁽⁷⁾。购买力的上升和需求欲望的转变形成强大的投资引诱是农村工业化的直接动力。同时，收入的集中意味着资金的集中，有助于使消费基金转变为生产基金，促进资本形成。90 年代农民现金支出中生产和储蓄借贷比例平均比 80 年代高近 20 个百分点。在消费与投资双重作用下，农村才能摆脱由于低收入和低资本造成的“贫困恶性循环”的压迫。同时必须看到，收入平均、层次单一，供给结构将始终滞后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难以支撑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合理的收入差距和相应的多层次、多阶段的差别需求，符合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原理，有助于建立前瞻性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需要投资带动，资金不足是农村经济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1987～1994 年，农户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 25.08%；但 1994 年绝对额仅 4 816 亿元，为城市的 28.8%。据测算，按无锡市基本农田建设标准的 1/2 改造现有的 6 000 万公顷中低产田，就需要 4～5 万亿元投资。因而一些人主张收入分配上偏向具有较高储蓄倾向或投资能力的人。这种偏重效率的理论是具有政策危险性的。农村目前尚有约 6 500 万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根据

1994年基尼系数测定,已属收入差距过大,如果形成两极分化格局,将铸成经济发展的严重梗阻。贫富悬殊在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贫困和收入悬殊不仅损害低收入者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降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经济发展成为利益冲突过程,而且最终使经济失去持续发展的可能。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倒“U”理论无论在价值规范和实证判断上,其宿命论的机械倾向都已受到发展中国家正反现实的批判。从各国的历史、现状、文化传统和特殊国情出发,资产分配、教育机会、技术选择以及政府的一般政策倾向这些制度安排在解释收入分配上比人均收入的自然增长更具有说服力。中国农民生活水平较低,收入中的增加部分,明显呈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趋势。1994年各地区农民家庭总支出构成按人均纯收入分组,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的北京、上海、广东、浙江中,生活消费支出比例除北京外都超过70%,平均生产性支出比例为24%;在人均纯收入1000~2000元的13个省份中,除福建外生活消费支出比例均低于70%,平均生产性支出比例为30%^{〔7〕}。考虑到已经存在的收入不均的情况,解决资金不足,只能通过农民联合投资(包括乡镇企业以工补农、建农的反哺基金)和从农业外引进资金以及政府参与。从经验上看,富有活力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成效取决于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各阶层的受益,政策制定者必须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上,制定出效率与公平相妥协的政策,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4. 人口文化素质结构的转型是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

人口文化素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技术接受力、熟练程度、市场观念、风险意识、经济价值观等多方位素质。现代经济对人口的需求已由外延的数量转向内在的质量,从而要求人口素质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表 5 农村经济活动人口文化结构						%
年份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1990	20.73	38.86	32.84	6.96	0.51	0.1
1993	15.29	38.21	37.43	8.2	0.7	0.17
1994	14.68	37.19	38.59	8.51	0.82	0.21

资料来源: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95》整理。

现阶段农村的初等文化型素质结构,仅略好于发达国家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在二元结构显著、城市工业化水平已相当高的条件下,农村人口素质难以承担技术扩散和组织创新的挑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解决,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人力投资实现体制的接轨。我们套用简单的人力资本存量公式,就能发现目前农村人力资源在严重缺乏的同时存在的严重浪费: $AHR=OHR+(1+\alpha)(1+\beta)E$

AHR为单个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存量,OHR为世代人力资本积累(非正式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总和,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进入人力资本,中国农村OHR折为3年);E为平均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α 、 β 为调整系数,反映在已受教育年限上形成的实际劳动能力和接受继续教育的能力, $\alpha=E/14$ (14为旧学制下大学生受教育总年限), $\beta=E/40$ (40为平均工作年限), α 、 β 反映了教育的不可分性。相应的劳动者总人力资本存量 $THR=M \cdot AHR$,M为总劳动力数。假设1990年农村所有文化程度劳动力(文盲除外)均属毕业(完成学制),通过加权平均,该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E为5.33年,平均人力资本存量AHR为11.34年,总存量THR为47.64亿年。而同期美国农业人口平均人力资本存量AHR为35.34年,MHR为0.929亿年。1990年单个农业劳动力负担人数,中国为3.3人,美国为87人^{〔8〕}。可见,中国农村人力资本赋存过于分散,在总量上有重大浪费,在个体上存在严重不足。

人力投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决定因素，对人的投资不仅使人力资本自身形成递增效益，而且能实现劳动与资本等要素的优化组合，带来整个经济的递增的规模效益。微观分析表明，个人受教育程度与其可获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从宏观上看，各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也是正相关的。尤其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和层次时，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更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人力投资包括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流动和迁移费用（国内流动与从国外引进）以及科研和技术推广费用，其中最核心的是教育投资。哈佛大学经济学者巴罗（Barro Robert）指出，穷国之所以赶不上富国，“关键在于教育投资不足”。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往往忽视教育的重要性，即使在政府编制的统计年鉴里，教育支出也被计入消费支出。90年代初农村人均教育支出不足总消费支出的2%，低于国际平均3.8%的水平，在1990年农村失学的400万小学生中，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仅占1/4；国家的农村教育经费也长期处于缓慢增长中，乃至引入社会救济的方式。1980年全国有各类科技人员近600万，其中农业科技人员32万，平均1万农业人口中仅有3.7名科技人员，1万亩耕地不足2名；1994年相应数据为90万、10名和6名，不及印度水平。按英克尔斯（Alex Inkeles）标准衡量中国现代化程度，代表人口质量的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和人均拥有的报纸数量与英氏标准的差距是十项综合量化指标中最大的，仅相当于其13.3%和13%^{〔9〕}，农村的指标更低。农村这种人力资本状况直接限制了对物质资本、农业技术的吸收能力，造成生产手段上的手工作业、技术应用上的保守、经营的落后和产品构成的低品质这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目前农业引进外资迅速的广东、山东、福建等省，都是中国人力资本丰裕的地区。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教育收益率一般很高，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有形资本收益率；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小学、中学与大学教育的收益率递减，与发达国家相反。投资教育对发展中国家是经济的，但必须注意结构。

表 6 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教育收益率水平 %

国家组别	教育水平		
	初等	中等	高等
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10个)	15	11	11
出口制成品的发展中国家(地区)	16	13	9
其他发展中国家(26个)	28	17	1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p14。

教育部门实际是熟练劳动力再生产的部门，教育本质上是国民经济的一大基础产业，不仅是劳动力进入市场的缓冲器，而且是高效的加油站。由于教育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是间接的生产性投资，经济功能上存在间接性和滞后性，供给和需求弹性小，在经济上存在整个社会受益的葡萄收获效应（外部经济），属于市场失效的公共品性质，需要政府介入来弥补分散的家庭教育决策的短期行为倾向和防止由收入不同带来的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达到最大的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由于学校教育经费是基本的投资，因此，把一切教育费用作为现有支出是严重的错误”^{〔10〕}。优先发展教育尤其乡村教育战略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共识。中国当前农村教育仍是升学教育，而农村受教育者实际需要的是些基本的农业耕作和管理知识以及园艺、木工、卫生学和营养学的知识技能。教育的内容与实际、人才的培养与需要在口径上极不一致。因此，在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力度的基础上，有必要改变农村教育结构，开展基础教育、中等技术职业教育和成人技术培训，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培养农民独立发展市场经济的科学素质和应变能力，为农村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创造条件。在对甘肃中部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线性预测回归模型中，文化水平综合均值是仅次于人均播种面积的显著性因子^{〔11〕}。1994年人均纯收入2000元以上的农村地区，文

教育部门实际是熟练劳动力再生产的部门，教育本质上是国民经济的一大基础产业，不仅是劳动力进入市场的缓冲器，而且是高效的加油站。由于教育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是间接的生产性投资，经济功能上存在间接性和滞后性，供给和需求弹性小，在经济上存在整个社会受益的葡萄收获效应（外部经济），属于市场失效的公共品性质，需要政府介入来弥补分散的家庭教育决策的短期行为倾向和防止由收入不同带来的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达到最大的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由于学校教育经费是基本的投资，因此，把一切教育费用作为现有支出是严重的错误”^{〔10〕}。优先发展教育尤其乡村教育战略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共识。中国当前农村教育仍是升学教育，而农村受教育者实际需要的是些基本的农业耕作和管理知识以及园艺、木工、卫生学和营养学的知识技能。教育的内容与实际、人才的培养与需要在口径上极不一致。因此，在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力度的基础上，有必要改变农村教育结构，开展基础教育、中等技术职业教育和成人技术培训，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培养农民独立发展市场经济的科学素质和应变能力，为农村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创造条件。在对甘肃中部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线性预测回归模型中，文化水平综合均值是仅次于人均播种面积的显著性因子^{〔11〕}。1994年人均纯收入2000元以上的农村地区，文

盲率为 9.6%，800～1000 元地区为 18.6%。就农民收入的支出结构看，高文化程度人口的消费和储蓄倾向趋于弱化，而投资倾向加强。据抽样调查，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中，1 万元基金投资倾向分别为 47.8%、65%、68%、71%^{〔12〕}。

5. 家庭结构变动与经济调整

农民家庭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口再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单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了“大锅饭”，强调家庭的利益和其在经济上的活力，使家庭利益真正与社会利益一致，形成农村经济的第一次飞跃。每个家庭基本自身利益判断基础上的微观经济决策和资源配置，是农村经济活动的起点。在对家庭构造变动的分析中除考虑传统家庭观念、生育观念、外部环境变化外，必须考察其内在经济动机。

表 7 全国农户状况

年份	乡村人口数(万)	乡村户数(万)	平均每户人口(个)
1990	89 590.3	22 237.2	4.03
1993	91 333.5	22 983.8	3.97
1994	91 526.2	23 165.2	3.95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95》。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户均人口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加，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减少。这基本改变了农村传统的“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的家庭和生育格局。其原因除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和宣传教育影响外，经济动因是主要的。

“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1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生产的规律也如此。现代农村经济对农村人口结构过剩已形成巨大压力，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和低素质劳动者过剩使人口再生产的预期成本提高，多生子女再不简单是“添一只碗”，而是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改善的重要人力投资。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建立和农村养老制度的完善减轻了人们对子女的预期回报，净财富转而由老年流向青年人。同时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提高，经济能力改善，生育的机会成本变大，生育意愿淡化。1987 年抽样调查，中国农村妇女生育率呈宽峰型，以 5 年为一个年龄别，在 20～29 岁生育旺期的妇女中，小学、中学、大学文化程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0.902、0.811、0.382^{〔8〕}，生育意愿随文化程度上升而明显下降。从家庭观看，现代家庭经济功能以消费和人口再生产为主，不主要表现为生产单位，农村经济改革使家庭成员在生产和分配领域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原有家庭纽带放松，维系大家庭的物质基础不复存在，不同成员间收入的差别导致了分离单过的倾向。1994 年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的人口（含本人），已由 80 年代的 2.26 人降为 1.57 人。农村家庭规模缩小和核心家庭增多至少有三方面影响。首先，它是农村建筑业兴起的强大动力和农村城镇化的最好时机。住房作为基本的生活资料，一向是农村居民消费的热点，进入 90 年代以来，农村每年建房约 6.6 亿平方米，今后还会出现持续的建房热潮。这不仅需要庞大的建筑队伍，而且对建筑材料工业、建筑科学研究和设计乃至家电、家具业带来了有效需求，能够引起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和文教、卫生、科研各部门的连锁反应，具有主导产业的作用。“建房热”将有力地配合农村城市化战略，各地应抓住机遇，建立新的居民点或扩建原有的小城镇，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实行适当优惠政策，鼓励农民进城，吸引住房投资，形成规模效应，发展城市经济和相关产业，从而使城市化与居民经济生活的发展走上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和谐统一。目前中国农村有小城镇 16 433 个，下辖 31 642 个乡，只要每个小城镇能增加安置 2 万人，就基本满足了农村人口转移的需要。第二个影响在于，核心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生产单位，这种小而全的结构模式必然追求规模经济，在生产上要求协作而非分散经营，在家庭联系上不宜

分割。土地经营规模过小的高成本效应比大家庭更直接和显著，但同时核心家庭对土地的依赖也明显低于大家庭，为优化家庭内部资源配置、实现收入最大化就必须作出取舍。这就为土地的流转和集中创造了压力和动力。第三个影响是农村老年人口的赡养问题。农村长期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网外，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和土地。目前农村老龄人口（60 岁以上）已超过农村人口的 9%，农村将在人均 GNP 不足 1 000 美元的低水平上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而据调查，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积累水平相当低，大量与子女分离的老人一旦生活不能自理，集体经济将很难承受。鉴于计划体制下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高农业税对农民的剥夺，国家有义务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在农村建立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

6. 启示

农村人口结构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存在大量的中间变量群、随机扰动因素和外部效应，但这并不妨碍通过科学分析把握其潜在的一般规律性。“问题和解决的手段同时产生”^① 消极的“鸵鸟政策”^① 只会延迟矛盾、激化矛盾，经济科学工作者应努力承担起社会生活中先知先觉者的人文价值，为问题的解决设计出最优的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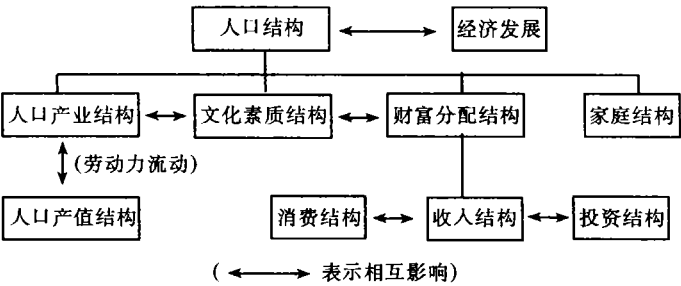


图 2 农村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系统流程

参 考 文 献

- 1 熊映梧，吴国华，论产业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0(3)
- 2 沈利生，周明武，朱运法，第三产业就业增长率将居榜首，经济日报，1996·12·18
- 3 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册第 274 页，商务印书馆，1981
- 4 农业部信息中心，农业信息快讯，1995(11)
- 5 张文贤，人口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6 邓组善，为民工潮转向创业潮创造条件，经济日报，1996·12·2
- 7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 8 中国人口年鉴 1992，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
- 9 卢大中，卢平，郭小鹿，人口与现代化，西北人口，1997(1)
- 10 Theodore Schltz, Investing in people: 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Qualit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11 常跟应，甘肃中部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析，西北人口，1996(3)
- 12 姜长云，不同文化素质农民经济行为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6(3)
- 13 马克思，1844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 卷，49 页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 卷，106 页

(本文责任编辑：徐 莉)

① 指回避现实的政策。